

讀政治經濟学教科书下冊的筆記

第一部分（从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三章）

一、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教科书中第一页到第二页^①上说：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些说法都很好。是应该这样说的。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说是客观必然性，就是说，它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它总是要来的。

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页1），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说到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得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页2），其实不只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谈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二、关于过渡时期

书中说：“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立起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页3）。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研究。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呢？

这里引了马克思的话：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中。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在若干年内实现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并且还要进一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页3），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当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发展”（页3）。在我国说来，大约至少要有一、二亿吨钢吧。今年以前，我们所作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刚开始。经过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以后，一九六〇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书中说，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又说：“每一个国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页4)。这个提法好。在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员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承认十月革命的榜样，承认“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同修正主义对立起来了。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很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为什么无产阶级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教科书说：是由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革命的中心是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后，十九世纪中叶革命的中心转到了德国；二十世纪初，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俄国；随后，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中国。当然，以后革命的中心还会转移。

俄国革命的胜利还因为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做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教科书说：俄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结成了联盟”。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的依靠是贫农阶层。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农总是动摇的，他要看一看，革命有没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有没有好处，看得比较清楚了，他才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十月革命是这样，我国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也都是这样。

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不能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里。书中所引列宁的话(页6)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起来。列宁曾说过，革命要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被压迫的痛苦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说来，印度也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印度不能象列宁、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印度曾是属于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点和中国不同，中国是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印度的共产党没有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到了印度独立以后，又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有一个成熟的党，是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为了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在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

级革命(辛亥革命)时,还没有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了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了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是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那时他们的革命活动很有生气。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已经堕落,到一九二四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能看到前途。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还不成熟,从主要意义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可能。并且也没有作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上在这里(第六页第三、四段)还有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之所以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这样说,是不完全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这种帮助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前进得快点 and 慢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点,没有帮助会慢一点。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四、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书上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可能性的。”(页5)这里说某些究竟是那一些呢?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了牙齿,它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

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准备两手: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让步,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都曾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到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表明了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就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经过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是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五、关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第五页最后一段说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但没有讲清楚。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宣布土地国有令。但是完成土地问题上的民主改革,也还用了一段时间。

我国在解放战争中,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土地改革。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

我们在解放战争中，除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外，还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官僚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日本、德国、意大利手中接受过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重，是八比二。我们解放后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如果以为，在我们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在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六、关于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九页上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确切。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讲，国家就是用来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

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个说法不完全。不只是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暴力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防止敌人的反抗。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怎么行呢？

书中在这里还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说得不完全。没有提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阶级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农民也要改造。我们的经验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他们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要半个世纪。在农村来说，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转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的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够逐步地以至完全地变过来。（按：书中在这里讲到“主要任务”时引用了列宁的话，与列宁的原意是不符合的。）

说话、写文章，力求合乎敌人、帝国主义的口味，这是欺骗群众，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而自己的阶级被蒙蔽了。

七、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问题

第十页上说。“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这是对的。

但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代表，有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想闹事，但闹不起来。这种情形好象是和苏维埃不同。但是十月革命以后在苏维埃的代

表中，有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有托洛斯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等，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的国家机关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部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

八、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十一页上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说得不对。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政策，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我们是采取没收的办法来实现公有化的。

十六页的第二段的意思是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当成一种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站在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在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小资本也一律没收么？是不是也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

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以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

日本人过去在东北的办法是消灭当地的大资本家，把他们的企业变为日本的国营企业或者垄断资本企业；而对于当地的中小资本家，则用建立母子公司的办法来加以控制。

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就每个步骤说，也是逐步进行的。这种办法使生产没有遭到什么破坏，而且在改造过程中发展了。我们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有许多新的经验，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项新经验。

九、关于中农

我国土地改革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曾经认为，这种情况不好。其实，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富农，而树立了自己的农村中的优势。

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页17）。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交给农民来分，这是一种恩赐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是依靠贫农，联合大多数的中农（下中农）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并且有一套具体的做法。就是：访贫问苦，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连，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展开阶级斗争。

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业中的中心人物”（页17）。这个说法不好。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会被富裕

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

书中对于中农没有分析。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还有新、老的区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一些。历次运动的经验证明，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这三部分人，政治态度较好，拥护人民公社的是他们。在上中农、富裕中农中，一部分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万多个生产队，其中，百分之五十完全拥护公社，没有动摇；百分之三十五的队基本拥护，在个别问题上有些意见或者动摇；有百分之十五的队，或者反对人民公社，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所以反对或严重动摇，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展开辩论，首先要改变领导。可见对中农需要进行分析。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书上说：“中农按其本性来说是两重性的”（页17）。对这个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作为私有者来说，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和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念比较容易改变。上中农和富裕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较浓厚，历来他们对于合作化有抵触。

十、关于工农联盟

十八页上讲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叙述工农联盟怎样才能发展和巩固。讲了对小生产的农民要进行改造，但是没有叙述改造的进程，没有讲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有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没有叙述整个改造过程中步骤和策略。

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是建立在土改的基础上；第二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实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到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就合作化来说，如果只是小合作社，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还必须从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工农联盟真正地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将逐步消失。

十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十九页第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有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因为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需要进行改造。文艺界的刘绶棠，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把知识当做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没有高价就不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搞电影的说党不能领导电影，搞歌舞的说党不能领导歌舞，搞原子能的说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事业。总之，说党不能领导一切。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

问题。不重视这个问题，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将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同页上讲到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这里只说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却是不完全的。我们的说法是在三条战线上，即经济、政治、思想的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说我们吸收资产阶级分子来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国家的管理（页20），也可以这样说。但我们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世界观，以及个别问题上的观点。书上在这里却不提改造。

十二、关于战争和革命

书上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页33）。又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现，“没有经过国内战争”（页36）。应当说，这些国家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的，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合而为一地进行的。这些国家的反动派是用苏联红军的铁犁犁掉了的，说这些国家没有国内战争，是只从形式看问题，没有看到实质的说法。

教科书中说：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页36）。其实这种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完全不同，只是名义上相同。我们解放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是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样的，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协商会议不感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以后我们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教科书说，中国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页39）。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起一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连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以前，从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还有十五年的战争，这里面有革命战争，也有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军阀混战。如果从一九一一年算起，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说是连续进行了四十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产生以后所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三十年。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片面地讲战争的毁灭性，对于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十三、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它们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着工党走。

列宁所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页34）。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

的改造，在东方，象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超过先进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在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了英国。

十四、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关系

第三十至三十一页上，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看做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于苏联自己的情况。苏联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是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那个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虽然比我们多，但是在一九三二年，机耕地的面积还不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合作化，完成得很慢，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在土地改革后，趁热打铁，而是间歇了一个时期。我们一些老根据地也出现过一部分农民满足于土地改革而不愿再前进的现象，问题并不在于沒有工业化。

十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只靠机器

八十五页上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大问题。

九十一页上讲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初期的任务，提到和敌对的富农分子的斗争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教科书对于合作化以后农村情况的叙述，却不讲富裕阶层的问题，也不讲内部矛盾。例如，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等等。

九十九页上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不能笼统这样说，一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十六、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么？

教科书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页48）这里把发展大工业说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社会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进革命。在革命中推翻了旧的上层建筑以后，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进，进行思想改造。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很清楚。

十七、列宁論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第六十三页上引用的列宁的一段话，讲得很好，可以用来辩护我们的作法，他讲到：“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十八、工业化的高速度是个尖锐问题

教科书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页64）现在在我国，速度问题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愈落后，速度问题就愈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来比较是这样，就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方的投资的增加相对地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原有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就增加得很快。上海解放后十年一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还包括资本家的投资二亿多元；它原有工人五十多万人，除了调出几十万工人以外，现在全市有工人一百一十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方，速度问题更加尖锐。

书上在这里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高速度的需要，而没有可能，那怎么能做到高速度呢？

十九、大中小并举是为了高速度

第七十一页上虽然提到我们广泛发展中小型企业，但并没有正确地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问题并不只是在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增加就业。在大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在洋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二十、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长期并存么？

教科书七十九页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由此推论下去，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的基础上。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教科书上不承认这个矛盾。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同样会“愈来愈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原料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过一个

时候就不适合了。我国在完成高级合作化以后，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出现了小社变大社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他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一些经济范畴是永久存在吗？能说按劳分配，集体所有制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象其他范畴一样是历史范畴吗？

二十一、所谓“彻底巩固”

“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105页），“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拿蚕的一生来说，不但它最后一定要死亡，而且在它的一生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这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要进行到最后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了新的质（新下来的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在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的变化，而且有质的变化——是部分的质变，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生出到死，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地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人死了，就达到整个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不断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如果没有大量的量变，没有部分的质变，最后的质变也不能来到。例如，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部分地更新，这就是部分的质变，工厂的规模、外形没有变，但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一样，一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的部分的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地发展和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部分的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长远地“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

有死亡、变化吗？难道不象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要灭亡，共产主义时期，也还是有不断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就只有量变，再没有不断的部分的质变么？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但是每一个阶段总是有个“边”。我们每天读书，从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结束，这就是“边”。拿思想改造来说，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是要长期进行的，但每一次思想改造的运动总有一个结束，就是有个“边”。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的战线上，经过不断的量变，不断的部分的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到那时，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然后又开始新的质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

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个“边”，要有笔眼。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段可能需要比前一段更长的时间。经过了后一阶段，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大为丰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了。

一零八页上说到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生产不断迅速扩大，生产率不断提高，讲了许多“不断”，但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许多部分的质变。

二十二、关于战争与和平

一零七页上说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使失业人数增加。”

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么？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么？

能不能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世界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情况和无产阶级统治下的情况区别开来。不消灭阶级，怎么能够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即使签定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仗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曾经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还是用常规武器。即使在两个阵营之间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可能打，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战争是阶级冲突的方法。只有经过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够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就不能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人类的阶级社会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注意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军队是阶级的实力的具体表现，只要有阶级对抗，就有军队。当然我们是不希望打仗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

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的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一零九页上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的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同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没有眼睛，它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苏联现在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

二十三、“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么？

一一四页上说社会主义社会“团结一致，坚如磐石”，说一致是“社会发展动力”。

只承认团结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就被否定了，辩证法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这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二十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权利

一一五页上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

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的手里，那么全国绝大多数迫切需要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这种钟惦斐这些人的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机关、一切企业掌握在那一派手里头，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手中，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的手中，这些机关、这些企业就可能变质，人民对这些机关、这些企业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有权利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是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二十五、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119页）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

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革命。我国的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当然，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物质能够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质实行按需供应，然后根据生产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

拿我们的人民公社的发展来说，在从基本队有制转变到基本社有制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实现基本社有制，对于社员，一般都是有利的。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他们不能象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于这种改变会不会抵触呢？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阶级，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二十六、所谓“中国没有必要采取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

一二二页上的第一段说得不对。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看到那个时候俄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断定无产阶级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没有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认为只要他们动手，就能使无产阶级政权垮台。于是，他们实行武装的反抗。这就逼着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激烈的办法，来没收他们的资产。那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还没有经验。

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了，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打垮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没收了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法来加以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一二三页上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描写得不对。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够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资本家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并不是“公方代表和资本家共同管理生产”。不能说，“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受到了限制”，而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教科书没有吸收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企业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当然现在来说，已经不只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会猖狂进攻的。一九五

七年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一九五九年又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表向我们进行了一次进攻。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策略是，拉住他们，又整住他们。

书上引用列宁的话（一二四页），国家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是对的。

二十七、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期限

一二六页上说，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这样说，而是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上说同页，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内，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倒可以同意。这就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一九七二年。争取提前两三年，到一九六九年。除了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

二十八、再谈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一二六页上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以前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强大的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段话讲得不对。

东欧这些国家，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

至于工业化和所有制改造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也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例，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先是简单的协作，然后发展为工场手工业，这时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工场手工业还不是用机器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造成了条件。在英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有所不同（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中初步成长起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从第二十四章到第二十九章）

二十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第140页上只是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而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可以说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总还是全民所有制，但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那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仍是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必须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妨碍这种积极性，就不利于发展生产。可见在全民所有制中也还有要解决的矛盾。至于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更是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例如，领导人采取平等态度，改进某些规章制度，“两参”“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好做。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但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的变化。

三十、集体所有制必然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143页上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没有讲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也是客观的必然性，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在我国有些地方就已经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城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一些经济作物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提高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来解决这个矛盾。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比工人高。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148页上说：“国营企业和合作经济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具有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就社会主义经济内部来说，两者的差别又是根本性的差别。教科书把这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就敌对势力来讲，是可以的；如果就它本身的发展过程来讲，那就错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是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不变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

若干年以后，人民公社的社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全国成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再经过一定的时期，才进而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

三十一、关于个人财产

149页上说：“另一部分是消费品，……成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这种说法使人

以为社会产品中属于消费品的部分都要分配给劳动者成为个人财产，是不对的。消费品中，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设备、公共医疗、体育设备、公园等等。而且，这一部分公共的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每一个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

150页把劳动收入和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及其他日常设备等并列起来，不好。因为储蓄、住宅等等，都是劳动人民收入转化而来的。

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象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国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该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该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靠社会集体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教科书在这里说，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包括个人付业。对于这种个人的付业不提公有化的问题。这样，农民就会永远只是农民。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之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个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否则就会使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僵化起来。使人们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同一页上说到个人利益同全民利益结合的问题，“这种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这里没有讲必要的扣留，而且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就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

接着在151页上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说得很空。不能解决问题。象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

三十二、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教科书154页的第三段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并不承认矛盾的动力。

接下去的一段讲得还好。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某些方面和领导经济的某些形式会妨碍生产力发展。而且所有制方面(例如两种所有制)也存在着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再下面的一段的说法就很有问题。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那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有的是非对抗性的，但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阶级斗争，但是还有斗争，有人民内部各派的斗争。

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经过很多的阶段，也一定还会有很多的革命。

这里说到依靠群众的“积极活动”来及时克服矛盾(155页)所谓积极活动，就应当包含着复杂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过时的经济关系的阶级”，这个说法对。但是，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虽然这些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也要经过斗争才能解决矛盾。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还是有先进的人和落后的人，有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的人，有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的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利于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农村的富裕中农，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这些变化进行抵抗。广东在农村同富裕中农展开八字宪法的辩论，就是证明。

166页的第三段倒是讲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斗争，讲得有点生气。但是接着，后一段中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三十三、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

157页上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应该看到，这里要有一个过程。认识规律，总是开始于少数人认识。然后是多数人认识。从不认识到认识，要经过实践的过程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得的，从来没有先知先觉。人们要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遭遇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的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就能够逐步地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也是不行的。

所谓“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这是不容易的，不经过一定的过程是不能实现的。158页上引用恩格斯的话：“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和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产生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说是“开始”，是“愈来愈大”，这就比较准确。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够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写出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能例外。

三十四、从原理原则出发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从第二十章以后，列举了许多规律。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而教科书的办法是不进行分析，文章写得很散。它总是从规律、原理、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经过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从现象出发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却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是从人都要死这个大前提出发得出结论，这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推

论。他们不懂得，大前提应当是研问问题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发现和证明原理原则。

三十五、先进经验能够毫无阻碍地推广么？

178页上说：“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可不一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科学的最新成就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人们不习惯，或者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就会遇到阻碍。例如，我们的密植、深翻这样的事情，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还是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和抵抗。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的东西的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根本不同的。

三十六、关于计划工作

183页上引用恩格斯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

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经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在这里说：“自发性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不相容的”，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实际工作中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合乎规律的。一定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就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必然不是一眼就能够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所有人都成了“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两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但也不是认识够了。如果说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184页上说，社会主义的特点是：“经常自觉地保持比例”，这是一个任务，一个要求。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斯大林就说过，苏联的计划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反映了规律的要求。

经常保持比例，同时也就是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就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出现了不平衡，出现了不成比例，人们也就进一步认识了客观规律。

在计划工作上，如果什么帐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的漏

洞也沒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会破坏比例。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沒有进行什么建设，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象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_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三十七、关于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和工农并举

186页上说到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的问题。

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資料优先增长，也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别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并举和其他几个并举，每一个并举中又有主导的方面。农业不上去，许多问题不得解决。我们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〇年。重视农业，就表现在拨给农业的钢材的数量上。一九五九年给农业的钢材只有五十几万吨，今年包括水利建设一共是一百三十多万吨。这算是真正工农业并举了。

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使大家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只要我们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三十八、分配决定論的錯誤观点

二十章中说：“利用工人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是国营工业高涨的必要条件”（页28）。二十一章中又说：“彻底实行经济核算，利用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在国家工业化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57）。二十五章中又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使工作者从物质上关心自己劳动的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页171）——象这样的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只会带来发展个人主义的危險。

196页上又说：按劳分配规律“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执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力之一”。人们不能不问，既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方向，怎么又把个人物质利益说成生产的决定性动力呢？

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論的錯誤观点。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应当是生产資料的分配。生产資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資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这是一种理論上的錯誤。

三十九、政治挂帅和物質鼓励

198页虽然承认群众的创造活动，但是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

发展计划的斗争，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200页上也说“庄员的主动性是发展农业的决定因素之一。”）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

紧接着又提到“首先”要利用物质鼓励因素，好象群众的创造活动是要靠物质利益鼓励出来的。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这反映了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靠物质鼓励，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半句话是说要尽最大的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开，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象这样地宣扬物质利益，唯物主义者成为不战斗的了。

四十、关于平衡和不平衡

207页末一段写得不对。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技术发展的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多人。地质勘探的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每逢一个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就会特别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也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书中的这段话既否认了资本主义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

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这本教科书中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都没有，这是不能设想的。任何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一直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就没有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每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教科书中没有充分运用辩证法，对各个问题没有用辩证法来研究。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 × × × × ×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能够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的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暂时的平衡。

生产力跑得快，造成了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关系的状况，

于是就要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求得适应。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他们之间达到平衡，是相对的。生产力总是要不断前进，所以总是不平衡。平衡和不平衡是矛盾的两个侧面，其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否则，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普遍的规律。这个普遍规律难道独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么？应当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适用这个规律。矛盾、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是没有条件的，是永远的。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教科书提到了国家。但未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国家论、阶级斗争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革命论，战略策略等等。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和规律，例如矛盾的统一，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十一、关于所谓“物质刺激”

213页上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人员的生产的第一需要”，所以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具有重大意义。这里的“一切社会成员”，讲得太笼统了。列宁也是社会成员之一，能够说他的劳动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吗？

214页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极大多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一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是对的。但是，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书上在这里还说到较为勤勉和积极的工作者在同样条件下能创造更多的产品。是否勤勉、积极，显然是决定于政治觉悟，而不决定于文化技术水平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另外有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很勤勉、很积极。原因是前一种人觉悟低些，后一种人觉悟高些。

书上说，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页213），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页214）。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变化。人不一定年年、月月、天天都要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也要干，而且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好，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不好，还有一部分人干的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是一样，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是解释不通的。

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要有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精神鼓励的原则。同时，物质刺激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还应该提集体利益，应该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 × × × × ×

在“对劳动的物质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一节（页234）中间，关于竞赛有些地方写得还不错，缺点是沒有讲政治。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我们要使人民有此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时的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勇牺牲，也并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内战时期多的时候有几十万，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上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了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这并不是因为沒有或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者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 × × × ×

二十八章说：“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劳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页245）

二十九章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页264）

这里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促使非熟练工作者不断上进，以便进入熟练工人的行列。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了多挣钱，就来学文化、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技术、学文化，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首先为了得高工资。

二十九章中还说：“按劳分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力量。”（页265），而且在第267页的末段，在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不断提高以后，未修改的三版本中还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样的话。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工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是消费品的分配，沒有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不会有产品的分配，不会有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

四十二、关于社会主义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232页上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领导人员的威信取决于他们联系群众的程度，取决于人民对他的信任。”这句话讲得好。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的合作。

四十三、关于突击和赶任务

233页上说：“消除赶任务的现象，按图表均衡地进行生产”。未修订的三版上这句话是“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

不能完全否定突击。突击和不突击是对立的统一。在自然界中，有和风细雨，也有疾风暴雨。突击和不突击也是波浪式起伏。在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常常发生需要突击的情形，农业生产要抢季节。唱戏要有高潮，否定了突击，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高潮。苏联要赶上美国，我们想不用苏联那么多的时间达到苏联这样高的水平，这些也都是突击。

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要落后者赶上先进者，这是要经过突击才能达到的。人与人、组与组、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都要竞赛，要赶先进，也就都会有突击。

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

四十四、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工作

258页上用小字印的一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益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象是吃亏了，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点和其他工业的基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有七千五百多万人，再搞这样两次大规模的运动，我们的水利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产品内的价值当然很高。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更可以增加得多，增加得快，农业生产可以更稳定。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也就更能够满足人民对粮食的需要。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赚了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中自己已经提出了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

裕中农里面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积极作用，但是象现在这样大量地普遍地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260页上说到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问题，他们那里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节，是不够的，还要有领导、有控制、我国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成为大自由。

261页上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带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由生产无政府状态产生浪费社会劳动的现象。”这个说法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发生危机，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当然也是由它的所有制决定的。

四十五、关于工资形式

272页上讲工资形式，主张以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我们是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片面强调计件工资，会造成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一部分工人中“为五大件而斗争”的心理，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有的材料说明计件工资制还有碍于技术革新和机械化的采用。

书上承认在生产自动化的情况下不宜于实行计件工资。一面说要广泛发展生产自动化，一面又说要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形式，这就自相矛盾起来了。

我们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这两年的年终跃进奖就是这种奖励，除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以外，其他职工中普遍有年终跃进奖，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自己评定。

四十六、关于价格的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书上说：“社会主义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页279）。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职工生活并不很坏。究竟是不断降低物价好，还是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是重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价格问题。相对说来，他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我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高，轻工业品价格低。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第三部分（从第三十章到第三十四章）

四十七、关于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

第二九七页说到基本建设中，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大建设单位同时搞得很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而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礎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初步安排，今后八年中钢铁工业要完成二十九个大型、近一百个中型、几百个小型钢铁基地的建设。中小型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变成先进的、土的变成洋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落后的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差武器的人打败拿好武器的人。内战的时候，抗日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没有全国的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了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就等于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

我们要实现象教科书上所说的全盘机械化（见页134），看来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在第三个十年中间。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半机械化和改良工具还是我们要提倡的。现在我们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头了，会使人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以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在农业上，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多少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了。无机肥料也要有。但是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使用，会使土壤硬化。

教科书中常说，“在一切部门中采用最新技术”，但这不是容易做到的，总是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在采用了某种新机器的同时，总是有许多旧机器。教科书上说到，一方面是建新企业，并对现有工厂进行设备更新，同时“充分合理地使用现有的机器和机械”（页438）这种说法就对了，将来永远都会是如此。

至于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一定要自力更生地搞。一九五八年提出了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的口号。事实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到的。过去，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靠采用新技术而在生产上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也靠采用新技术而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一定要这样做，也一定能够做到。

四十八、先有拖拉机还是先有合作化？

第三一八页上说：“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

百分之九十九还是用木犁和马拉犁”，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观点。而同一页上（第一行）所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开辟了广阔的场所”则是对的。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主要不是由于他们没有拖拉机（相对地说来他们比我们多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没收土地是有限额的（有的国家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才没收），是用行政命令来进行没收工作的。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农、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有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军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四十九、“关于一大二公”

苏联的集体农庄过去合并过两次，由二十五万多个合并为九万三千多个，又合并为七万个左右，将来可能还要扩大。教科书上说，要“加强和发展各集体农庄的生产联系，组织各集体农庄之间的公用生产企业”等等（页326）。事实上有些方面和我们的办法类似，只是不用我们的说法而已。

当然，苏联集体农庄的扩大规模，按户数人数来说，可能不会象我们这样大，因为他们农村人口稀、土地多。但是，能够因为这样，就说现在的集体农庄再不需要扩大了吗？我们的新疆、青海这些地方虽然人少地多，但是仍旧需要搞大公社。我国南方几省，有些县（如闽北的一些县）也是在人少地多的条件下搞起了大公社的。

扩大是个重要问题，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说，量变必然带来部分的质变。

五十、特别强调物质利益的原因何在？

在集体农庄制度的一章内反复讲个人物质利益，如320页、322页、331页等等。

现在特别强调物质利益，总有个原因。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是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两重性，任何事物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遗传和变异也是对立统一的两重性，如果只有变异的一面，没有遗传的一面那么下一代的生物和上一代的生物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狗就不成其为狗，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可以起好的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

生物，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一定形态固定起来。或者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但是如果只有遗传的一面，没有变异的一面，那么就沒有改进、发展，就永远停顿下来了。

五十一、事在人为

书上说：“集体农庄有形成级差地租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页343）。

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其实也还是事在人为。例如，在河北省内，京汉路线的机井很多，津浦路沿线的机井却很少，自然条件相似，交通同样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却各不相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或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事在人为”。

同是上海郊区。有的区养猪养得好，有的区却养不好。上海属的崇明县，原来说那里各种自然条件，例如芦苇多，不利于养猪，现在打破了畏难情绪，对养猪事业采取了积极态度以后，却看到这些自然条件不但不妨碍养猪，反而有利于养猪。实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体化，都是“事在人为”。北京昌平区常闹水旱灾害，修了十三陵，情况改变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吗？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以后再用三年，沿黄河完成九个大型水渠的建设，也都证明“事在人为”。

五十二、关于运输和商业

运输、包装，不增加使用价值，但是增加价值。运输、包装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沒有运输、包装，生产过程就沒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使用价值虽然生产出来了，也不能实现。例如：煤炭在矿山上开采出来了，如果堆在矿山，不由铁路、轮船、汽车运到用户手中，煤炭的使用价值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第三五五页说，他们的商业系统是两套，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此外，还有所谓“无组织的市場”，即集体农庄市場。我们是一套，把合作社商业合并于国营商业。现在看来，一套好办事，并且各方面节省得多。

第三五七页提到对商业的公共监督。我们对商业的监督主要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一套。

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社会必要的劳动，沒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的消费和生活的消费）。

五十三、关于工农业并举

第四〇八页上说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未修订的三版本中在这里还特别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

工业的发展是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沒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菜蔬的供应，总是要从外省运粮食，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沒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我们过去沒有了解到，恰恰是东北这样的地方，特别是辽宁这样的省，应当好好抓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今年我国估计可生产钢材一千四百万吨左右，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这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是工农并举了。这样做，当然不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

第四〇九页上说，在个别时期，要加速落后了的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这是好的。但是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所造成的比例失调不能说成只是“局部比例失调现象”。这种比例失调不是局部问题。

第四一〇页上说：“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这里只讲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

五十四、关于积累 水平问题

在波兰这个问题现在成为很大问题。他们起初强调物质刺激，增加工人工资，不注意提高工人觉悟，结果工人只想多要钱，不好好干，工资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吃老本的情况。现在逼着他们不得不出来反对物质刺激，提倡精神鼓励。哥穆尔卡也说钱买不到人的心。

特别强调物质刺激的，看来总是难免走向自己的反面。开了很多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满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兑现而不能兑现的时候，就会被迫地走到强调物质刺激的反面。

根据第四一八页上所说情形，苏联积累资金约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我国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五八年是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五九年是百分之四十二，看来今后我国积累比重经常保持在三十以上或者更多是可能的。重要的问题是生产大发展，只要生产增加了，积累比重大一点，还是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

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这是经常的任务。如果以为只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应当这样做，那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要节约、不要积累了吗？

第四部分（从第三十五章到结束语）

五十五、关于共产主义的国家问题

第四二九——四三〇页上说：“在共产主义的高阶级阶段，……国家将变成不需要的东西而逐渐消亡。”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很危险。第四三一页上说，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就还是必要的，这个提法对。紧接着，书上又说：“但是，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这句话不好懂。国家的性质是压迫敌对势力的机器，国内即使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对于国外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所谓国

家的形式不外军队、监狱、捉人、杀人等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家的这些形式到了共产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

五十六、关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第四三三页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但是还有敌对阶级的残余。“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要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

书上在这里接着声明：“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矛盾。”不过是附带的声明罢了。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就应当从矛盾的分析出发。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生产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

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他们根据当时社会发展条件所预见到的。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新的任务一定又会提出来。

五十七、关于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前途

第四五〇页上说：“集体农庄合作社生产关系的形式完全符合农村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需要。”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有一篇苏联的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不合并时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以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说现在共一万人，计划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并在中心点周围分建各住一千人的七个居民点。这个材料可以说明现在的集体农庄的形式已经不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了。

书上这里说，要“全力加强和继续发展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既然要发展，要过渡，怎么能“全力加强”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要讲巩固，但不能讲得过头。书上讲了模糊的前途，但一讲到具体措施就不清楚了。

书上讲要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但是在我们看来，首先必须把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所谓把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是要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工人，由国家统一包起来，发给工资。现在我国农民每人平均全年的收入是八十五元，将来如达到每人一百五十元，而且大部分由社发的时候，就可以实行基本社有，这样，再进一步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

五十八、关于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第四五一页第一段对将来农村建设的设想很好。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五十九、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建立经济体系问题

第四六四页至四六五页上说：“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个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不说每个省份不必生产能靠其他省份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我们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只要不妨碍全局。

欧洲好处之一是全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全国大体上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全国是统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是相对的统一，又是相对的独立。各省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例如庐山会议的决议，就是如此，它既合乎全国的需要，也合乎各省的需要。能说只有中央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地方就不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吗？我们是在全国统一计划下，提倡各省尽可能各搞一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够就地取料，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去办，以前曾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种工业，象上海这样的城市工业产品会没有人要。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上海已经提出了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他们还是有事情做。

为什么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呢？正确的办法应当是，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搞好，吃饭靠外国、外省，危险得很。

有些国家很小，确有书上所说的情形：“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那当然不要勉强去搞。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六十、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能够“拉平”么？

第四六五页第三段说：“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各国的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革命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个父亲生十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能够拉平呢？“拉平”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平衡。拿广东省的卫生工作来说，佛山市和歧乐社搞得很好，因此佛山和广州不平衡，歧乐社和韶关不平衡。反对不平衡是错误的。

六十一、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

第四七七页上说到社会主义国家贷款和帝国主义不同。这个叙述是符合于事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比资本主义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

六十二、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

第四八一页上论述“两个世界体系的竞赛”。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论点。教科书在这里强调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间“建立和发展”经济联系。这是把实际上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的观点的后退。

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教科书避开了这种斗争。

六十三、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评

第四九三页上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论点”（页493）所指出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一条罪状是说斯大林抱着这样的观点：“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业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关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当时的商品生产，同三十年前“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乃是必要的东西。”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问题，在斯大林只是一种设想，他并且说过“推行这种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的经济计划。教科书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他们现在做法的一个真正的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六十四、对教科书总的看法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否定这本书，还不能做这个结论。

书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经济，不是为少数剥削者牟利的经济。

书上说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能说是错误的，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说的是这个。书上也说了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等等。就这些方面看，这本书还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至于承认有计划、按比例之后，如何按比例那是另一个问题，各有各的办法。

但是这本书中，有些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书上不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不讲两条腿走路。片面地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宣扬物质刺激。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书上不是从矛盾出发。他们实际上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主义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事实上，他们的社会中还有阶级斗争，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社会中还有三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当然这种个人所有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有所不同。那时农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上，现在是脚踏两只船，主要靠集体，同时又靠个人。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有斗争。教科书上不讲这种矛盾和斗争，不提倡群众运动。书上不承认先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向共产主义过渡。书上用什么“接近”，“融合”的模糊的说法来代替一种所有制变为另一种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变为另一种生产关系的观点。

就这些方面看，这本书有严重的缺点，有严重的错误，是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没有说服力。读起来没有兴趣。

书上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它总是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只下定义，不讲道理。其实定义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书上凭空地提出一大串规律，却不是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发展和证明规律。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不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势如破竹高屋建瓴。问题不突出，文章没有吸引力。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

这本书看来是几个作者分别一章一章地写的，有分工而无统一，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加上用的是从定义出发的写法，使人觉得好象是一本经济学辞典。作者相当被动，很多地方自己同自己矛盾，后面同前面打架，分工合作，集体写书虽然也是一种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是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写，象马克思他们写出来的书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科学的著作。

写书有批评对象，才有生气。这本教科书，虽然也说了些正确的话，但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许多地方使人觉得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并不真正内行。看起来这本书是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没有概念、规律这一套，而作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这两种人没有结合起来，也就是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这本书表明作者没有辩证法。写经济学教科书也要有哲学头脑，要有哲学家参加。

沒有有哲学头脑的作家参加，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教科书来，是不可能的。

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九五五年初出版的，但是主要的骨架似乎在这以前就定下了。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架子就不大高明。

苏联现在也有人不同意这本书的写法。格·科兹洛夫《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一文，对这本书的批评，提出了带根本性的意见。他指出这本书在方法上的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明规律。他提出了结构方面的建议。

从科兹洛夫这些人的批评看来，在苏联也可能产生作为这本教科书的对立面的另一本教科书来，有对立面就好了。

初步读过这本书，可以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作中心，仔细讨论研究一下，并且搜集一些材料，也看一下不同于这本书的论点的其它已发表的文章和书籍。在有争论的问题上，有些什么不同意见都了解一下。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我们要批评和反对错误的意见，但也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要勇敢，也要谨慎。无论如何他们写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有了这本书至少可以供我们议论，并且由此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六十五、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

苏联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写，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分配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个基本矛盾。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发在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的后面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因此，如果还照抄马克思的办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可能反而把问题模糊起来，使人不易了解。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我们写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时也要写全民所有制本身的变革如下放体制，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专管，有的由县管；公社管的企业，有的是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不论中央管的，或者是各级地方管的，都在统一领导下，而又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关于在生产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除了有句把“同志式的合作互助的关系”这样的话以外，根本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所有制问题解决后的最重要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一定的所有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

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之内总有限度，但是在这一定时期内，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我们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样一套。

关于产品分配，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六十六、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发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的问题，也是从现象出发的。敌人大、我们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一个据点，而其他的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吃它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去牵制其他的敌人。这样，我们在这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加上他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可以完全消灭这一部分敌人。

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事情反复出现，才成为规律，才能够被人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是十年左右出现一次，经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地，而不能按劳动力分，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后才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们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并且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他们的口号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他人按劳动力分。这种办法，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土地应该怎么分法，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弄清楚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一部书中堆满了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这本教科书的缺点正在这里。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的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六十七、哲学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

资产阶级的哲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候，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来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十八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并不因为已经有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有法国的；并不因为已经有了英国、法国的，就不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当然更是要密切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们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补 遗

一、关于我国的工业化问题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即使这样，我们还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因为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工业产值占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现实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我们“八大”一次会议曾经说，要在第二个五年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现在看来，我们再三年，

主要工业品产量可以超过英国。然后再有五年，可以实现建立工业体系的任务。

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么，我们的钢就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方法很有意义。我们永远总是提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很远，我们一切要争取赶上它。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远洋轮船自己运货，说不过去。

一九四九年我国拥有机床九万多台，一九五九年增加到四十三万台。日本一九五七年有六十万台。拥有机床多少，这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机械化水平还很低，从上海就可以看出来。根据最近的调查材料说，那里的现代企业中机械化劳动、半机械化劳动、手工劳动各占三分之一。

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然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从一九六〇年起的十三年中还要紧张地努力。

二、关于人的地位和能力

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页 213），未必如此。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青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些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

有很多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常常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提高织布机效力的技术，有助于使纺织织布、印染的能力平衡。这个新技术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

知识是经过困难得到的。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丢了官，“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象“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孔子也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受了挫折，才转过来决心搞学问。他团结了一批“失业者”，想到处出卖劳动力，可是人家不要，一直不得志，没有办法了，只好搜集民歌（“诗经”），整理史料（“春秋”）。

历史上许多先进的东西不出在先进的国家，而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国家，英国、法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普通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但这里确是个问题。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

人这种动物有一个毛病，就是看不起人。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是看不起俄国的，中国现在还处于被人看不起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的地位。人们看不起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三、关于依靠群众的问题

列宁的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了这句话以后说，“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页8）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联共中央一九二八年的一个决议中说，“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页65）这个话也说得很好。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了，就不那么靠群众了。

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是要“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页163）说得好。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俄国的苏维埃是群众创造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群众创造的。

四、关于苏联和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比较

教科书一二五页上引用列宁的话：“国家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进行怠工、破坏，逼着工人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能发展。

在内战时期，俄国的困难确实很大。农业被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在实际上的是无代价地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在内战结束以后，才用粮食税制来代替余粮征集制。

我们的内战时间比他们长得多。二十二年间我们在根据地中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购买粮食的办法。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地依靠农民。

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对付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为需要富农的粮食，所以对富农采取限制的政策。这有

点象我们在解放初期对待民族资本家政策。只有等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共生产了四亿普特的粮食的时候。才对富农下手，提出消灭富农、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口号。（注）而我们呢，却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

苏联的合作化，“在一开始农业曾经付出很大的代价”（页91），这一点，使东欧许多国家在实现合作化的问题上增加了许多顾虑，不敢大搞，搞起来也很慢。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很多人不信，现在相信的人慢慢多起来了。

五、关于总路线的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

全国解放的初期，我们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一九五五年基本完成三个改造的时候，在年底和一九五六年春，主席找了三十几个干部谈话，结果提出了十大关系，提出多快好省。当时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沙皇时代的俄国原来生产钢约四百多万吨，到一九四〇年发展生产钢一千八百万吨，如果从一九二一年算起，二十年中只增加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都是社会主义，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后来提出两种方法的问题。同时还搞了一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此外，当时还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后，出来了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这条辫子，举行猖狂进攻，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回击。同年九月的党的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会等口号。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上多快好省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搞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不准再反冒进，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如无南宁会议，搞不出总路线来。五月，××同志代表中央向八届二次大会作报告，会议正式通过总路线。但是总路线还不巩固。接着搞具体措施，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北戴河提出钢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报纸所说的后院钢铁。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又夹着金门打炮。这些事情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工作中也出现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把粮食和副食品吃得紧张起来，刮共产风，百分之几的日用品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钢产量，北戴河定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又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一切都被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两次郑州会议不提，武昌、北京、上海会议不提。等到“左”已经反掉了，指标已经落实了，在反“左”必出右，庐山会议上需要反右的时候，出来反左了。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

（注）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通过农村的交换卖出了大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多少呢？大约八千万普特，其中商品粮食约为三千万普特”。所以斯大林断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斯大林接着说：“现在我们有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因为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不下于四亿普特，其中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见《斯大林全集》十二卷第148页。）

现在比较巩固了。但是，事不过三，恐怕还要准备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总路线也将更加巩固起来。据浙江省委的材料，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共产风也还可能再次出现。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那次曲折，国际上出波匈事情，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这次曲折，是全世界反华。

一九五七年和庐山会议的两次整风反右，把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残余势力批判得比较彻底。使群众在它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同时破除各种迷信。

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以为合作化了、公私合营以后就解决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庐山会议实际上也是进行这个革命，而且是很尖锐的革命，如果不在这次会议，把右倾机会主义的那条路线打下去，是不行的。

六、关于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及其他

我们应当把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斗争看做一件大事。列宁是把它看成一件大事的。斯大林也这样看，他所说的革命的间接后备军就是指这个。中国搞革命根据地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背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那么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就只是一部分敌人，而不是全体敌人，而且我们常常能得到休整的时间。

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而且不齐心，互相勾心斗角。朝鲜战争中，美国和他的同盟国也不齐心。战争打不大，不但是美国下不了决心，而且英国不愿意，法国不愿意。

国际资产阶级现在非常不安宁，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的时候不同了，变化了。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来年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一九五九年，十四年中已经来了三次。

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还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个战败了的帝国主义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

七、中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够最迅速

西方资产阶级的舆论中，现在也有人承认中国是“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康伦公司”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就说到这一点。）

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进行过工业革命，比起以往的所有国家的工业革命，中国看

来将是最快的一个。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我们彻底地进行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迷信，力求使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得到彻底解放。

① 这个笔记所指的教科书的页码，是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的、大字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三版增订本的页码。